

鼓浪屿文史资料

第六辑



鼓浪屿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厦门市鼓浪屿区委员会 编

2001年1月

目 录

为厦门大学奠下基石的林文庆校长 张宗洽(1)

留美归国的著名园艺学家李来荣教授 彭一万(18)

黄舍辛勤六十秋

——缅怀方德植先生 石文英(42)

我所知道的周辨明教授 周长楫(49)

李清泉与“闽侨救乡运动” 刘晓斌(55)

丹青之树

——画家杨夏林先生 曾华伟(62)

回忆先父许霏先生 许文堤(68)
许文森

厦门美术广告的元老叶近勇 叶碧玉(78)

李文清教授谈王亚南校长 张宗洽(82)

我所知道的李芳远先生 陈全忠(84)

黄建华老先生访谈录 何丙仲(88)

七十年前的一次重要会议

——记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址 胡冠中(91)

协助林尔嘉与洋人打官司的律师是谁? 常家祐(95)

各式各样的鼓浪屿建筑 龚 洁(100)

李清泉别墅——榕谷 李清月(113)

国仇家恨永记心头	范寿春	(119)
鼓浪屿见闻录(二)	洪卜仁	(124)
龙头市场的变迁	陈全忠	(130)
鼓浪屿的数字地名景观		
——鼓浪屿特色之一	杨纪波	(136)
《感旧录》(选载)	庄克昌	(143)
《鼓浪屿志采访录》(摘要)	江仲春	(158)
鼓浪屿史料	佚名提供	(174)
补白(4则):		
郑成功部属在鼓岛之遗迹		(54)
弘一大师致李芳远手札两封		(99)
英军侵占鼓浪屿时之民谣		(123)
近代诗人咏鸦片战争之鼓浪屿		(129)

为厦门大学奠下基石的林文庆校长

张宗洽

鼓浪屿笔山路5号内有一座楼房，是著名的医学博士、原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先生的故居。提起林文庆先生，在新加坡可谓万人敬仰、妇孺皆知。但在厦门，对他的事迹全面了解的似乎不多。就是在厦大，谈起过去的校长，人人都知道萨本栋和王亚南，因为在校园内或建有其坟墓，或立有其雕像。而对林文庆却连许多老教授都不甚清楚。时间才过去数十年，这位当年被陈嘉庚先生聘请来厦大当了16年校长，为“南方之强”的厦大奠下第一块基石的林文庆先生，似乎已被人们淡忘得差不多了。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大家都敬仰陈嘉庚先生育才兴学的事迹，那么，对这位协助陈老为厦大的建立作出巨大牺牲、有过重要贡献的林文庆先生，理应有个足够的认识和公平的评价。对他的若干误解，在思想解放的今天也应当予以必要的澄清，这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林文庆先生(1869—1957年)字梦琴，祖籍福建海澄县(今龙海市)，生于新加坡一个华侨家庭。其祖父林玛彭于1839年自海澄县五贯村移居槟榔屿，其父林天尧，世居新加坡。林文庆童年先在新加坡福建会馆附设的书院学习《四书》、《五经》，又在市立英语小学肄业，后来升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学习。1887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到英国爱丁堡大

学医学院攻读医学，1892年获医学内科学士及外科硕士学位后，应聘在剑桥大学从事病理研究，半年内完成学术论文，发表于皇家学会学报。1893年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挂牌行医。他与同学罗伯逊合资开办了“九思堂”西药堂，1904年他参加创办英皇爱德华医学院，并荣获名誉院士称号。林文庆首先是一位医学博士，他发明了治“香港脚”的药水（他把这药水取名A. u，即厦门大学的英文简称），孙中山也是学过医学的，对林文庆的医学造诣很敬重，1912年孙中山电召林文庆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实即卫生部总长）之职，后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林文庆才回到新加坡。于此可见他当时在医学上的声望。他还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和医生。

林文庆不仅挂牌行医，治病救人，以其医学知识贡献于社会，还关心国事，推动社会的进步事业。他很早就在英国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支持孙先生的革命活动。1900年6月，孙中山因营救日本朋友宫崎寅藏，被新加坡政府逮捕，林文庆利用他的关系网，向英国当局疏通，孙中山和宫崎二人终获释放。早在辛亥革命前，林文庆就带头剪掉辫子，并劝说朋友剪辫，他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吸食鸦片。1906年，林文庆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组织的同盟会，从此便一直追随孙中山。他生在新加坡，因此加入英国籍，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利用辞典努力学习普通话，热情传播中华文化。他和新加坡著名律师宋旺相于1897年合办《海峡华人》杂志，又与丘菽园组织“华人好学会”等社团，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讲座，在华侨中推广汉语。1899年，他在新加坡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华女校。他通晓英、法、德、荷、日、西、马来亚等多国文字，交游甚广。由于他热心工作，曾被当地政府推举为立法院华人议

员、任过新加坡市政局委员，内务部顾问、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要职。1911年，他到欧洲各国考察研究，并作为中国代表，先后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世界人种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在德累斯顿召开的卫生会议，一度还担任驻伦敦中国公使馆秘书。

林文庆在经营实业上也很有才能。1912年，他创办新加坡华人商业银行，1920年，又集资成立华侨保险有限公司。他听到一位英国农业专家谈起巴西的橡胶种子可在南洋种植后，便大胆尝试，和陈齐贤一起经营马六甲橡胶园，获得巨大成功。在他的影响下，陈嘉庚先生也开始经营橡胶园，同样获得成功。陈嘉庚称林文庆是“南洋种橡胶之祖先”，林文庆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因此受到英国政府的嘉奖，新加坡人也十分尊敬他，认为他是华人中的杰出人才。

陈嘉庚先生热爱祖国，深知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他在集美建了许许多多的中小学校之后，决定再办厦门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先是聘邓萃英为校长，但开学不久邓便辞职，实际上邓氏对厦大没有多大贡献。在重新考虑校长人选时，陈嘉庚认为林文庆最合适。林文庆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是医学博士，也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又有社会活动的经验和领导能力，是难得的人才。在陈嘉庚的敦请下，林文庆博士接受了这一任务，放弃他在新加坡已有的事业基础和很高的经济收入，于1921年7月4日抵达厦门，担负起筹建厦门大学的重任。

厦大初创之时，建筑校舍是当务之急。校舍的设计与建筑，是陈嘉庚亲自抓的，但林文庆也协助陈嘉庚，在征地以及和地方官打交道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至1922年年底，厦大的首批五幢大楼即群贤楼、映雪楼、囊萤楼、同安楼、集美楼陆续竣工。1925年12月，生物院、理化院及笃行楼、博学楼、兼爱楼

等第二批新校舍又宣告落成。

林文庆到校视事后，定厦大校训为“止于至善”（原为“自强不息”），亲自为厦大拟订《校旨》，制订有关章程，绘制校徽，设立校评议会为最高议事机关，实行民主治校。他强调要“使本校之学生虽足不出国门，而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他的办学主张是和校主陈嘉庚先生深入研讨过，并得到陈先生赞许的。他在厦大《校旨》中，强调要继承发扬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强调大学的研究功能，提倡融会贯通，创造“最新最完善之文化”。对教学，他要求以“切于实用，造就应用科学人才为前提，养成各种高等专门人才”。对教师，他主张采取“人才主义，毫无畛域之见，对于各学科之著名高等人才极力罗致，使之尽毕生之力以从事各学科之教授与研究”。他所聘用的教授，有留美的、留英的、留法的，也有留德、留日的，不拘一格。为了延揽优秀人才，他不惜重金聘请，厦大教授月薪400银元，比国内一般大学高一倍，还规定种种奖励教师的办法。他对国文和英文两科特别重视，也重视科学研究，设立种种机构，希望厦大“成为我国南部之科研中心点”。对学生成绩优良者，毕业后还资助送往外国留学，回国后来厦大任教。对图书、实验仪器及各种设置，“拟特加注意，不稍存吝啬之心”。对成绩优良而家境贫困的学生，可以享受陈嘉庚奖学金之优待。他鼓励学生组织学生会，自己管理学生一切自治事宜，“以期养成高尚之人格，发扬美满之民族精神，于学校内造成一种模范社会，以为将来服务之预备”。他和陈嘉庚先生一样，对卫生和体育极为重视。在学校内设立体育部和卫生处，聘请专门高级人才负责此事，学生入学前须经体检，不合格者不许注册，每日须习早操15分钟，每星期须习课外运动2小时，以锻炼

体格。在学校内设立医院，“对疾病之预防，学生之卫生，均特加注意”。据说，他每周都要亲自到宿舍和膳厅巡视一次，察看学生的膳宿是否合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学生患病，有时他还亲自为之诊治。

在林文庆的致力运筹下，厦门大学很快就走上正轨。文、理、教育、法、商五学院建立起来了，各种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也相继制订出来了。他邀请国内外的学界名流到厦大讲学，还向海外招生，使华侨子女有回国学习深造的机会。他是医学博士，对理科比较内行，所以理学院的各种设备以及科研成果自然也就更为出色。单以生物学科来说，当时发现并命名的“陈子英文昌鱼”、“陈嘉庚海参”、“林文庆水母”，在学界都享有盛誉。在他主持厦大工作的16年内，培养成才的著名专家学者如曾呈奎、卢嘉锡、蔡启瑞、林惠祥、叶国庆、黄典诚等不知有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厦门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南方之强”，林文庆是奠基人之一。厦门大学有今天，前贤筚路蓝缕之功，是应该给予大力赞扬的，是应该得到公平的评价的。

林文庆任厦大校长时住在鼓浪屿笔山路5号他自己的公馆中，每天到厦大上班是坐小船从鼓浪屿驶抵厦大海滨的一个小码头（今厦大医院附近）。因林文庆是鼓浪屿的大名人，鼓浪屿工部局和会审公堂的一些重要会议，也经常请他参加，他还一度充任私立鼓浪屿医院的董事和院长，为民众服务。由于他深谙英语，1930年他还兼任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民族周刊》的主编。老干部黄猷告诉我，林文庆就是在鼓浪屿居住时把屈原的伟大诗篇《离骚》翻译成英文的。林文庆虽深谙英文，也懂得古汉语，但他仍认真对待，请了一位叫“罗先生”的外国人和熟悉古诗词的贺仙舫帮助他工作。此事贺仙舫后来亲口

在课堂上告诉学生。《离骚》英译本出版后深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权威蔡尔士教授誉之为“二十世纪初叶的英译佳作”，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也作序推荐。

正当林文庆办学初具规模之际，1924年4月间，厦门大学爆发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学潮。这学潮是因林文庆在厦大校庆三周年集会上发表演说推崇孔孟之道而引起的。他说：“中国各大学之教授，多注重外国新学说新知识，于中国古来文化不甚研究。我谓无论大学中学，皆当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我人私淑孔孟，最重信义，自中人以上，皆知信义所在。今年为本校三周年，即为本校校董陈嘉庚先生知命之年。陈先生在南洋经商，最为发达，以其汗血之资，创办集美学校及本大学，其尚义为国人所共知，而其商业发达皆由信用所致。”又说：“然我最为中国幸者，中国五千年之文化，至今犹见昌明。彼波斯、埃及、印度等国亦古代文明国也，今其古代之文化胥归湮没。我周公所制之周礼，至今尚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当陈校董在南洋聘予回国任校长时，予询以办学宗旨，陈校董答当注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予是以欣然回国。予亦尊重中国固有的文化也。今之学生，能以中国古代之文化为基础，则庶乎近矣。”在经过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思潮影响之下的学生，听了这些话，感到十分逆耳，认为校长思想陈腐，影响校誉，于是掀起“驱林”学潮，要赶他下台。一石激起千层浪，厦大沸腾起来了。但师生之中，对此意见也不一致，有些闽南籍学生如林惠祥等，对海外情况比较了解，就反对这种激进的打倒校长的做法。林文庆在陈嘉庚支持下，也不妥协，主张辞退教授欧元怀等四人，这更加剧了矛盾。这场学潮最后导致欧元怀等九名教师和二百名学生离开厦大，到上海另行创办大夏大学。

时至今日，我们不妨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林文庆究竟讲了哪些错话。林文庆受过西方的教育，又是基督教徒，他不去吹捧上帝和圣经，不去鼓吹全盘西化，而反去宣扬孔孟之道和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请教过许多熟悉华侨史的学者和侨务部门的领导，他们普遍认为，华侨身处异国，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增强凝聚力，而这凝聚剂只能是汉语和中华传统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他们在南洋，大力开办华文学校，推广汉语，学习四书五经，甚至崇信关帝、观音和妈祖等等，其实质就是对祖国文化的认同，这正是他们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林文庆是尊孔的，他对孔子很崇拜，经常引用孔孟之话来阐述问题，有时讲得好，有时讲过头。如他说应重视我国古代文化，要中西结合，祖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精粹之处，值得宏扬等，这有什么错？又如说陈嘉庚事业成功就在于他讲信用，“人无信不立”也是儒家的格言，这也是符合实际的，谁能驳倒？但有些话未免过头，一到孔子诞辰，全校师生都要放假，在全国少见，未免不合潮流，难怪要引起学生反感。中华传统文化也并非只有孔孟一家，还有诸子百家，要讲清这些问题并一分为二地分清精华和糟粕，即使在今天，也绝非易事。所以，作为侨生出身、从海外归来办学的校长，讲错几句话，办错一些事，也是难免的，不足为怪的。他追随孙中山，追求民主共和，和袁世凯等想利用尊孔搞复辟，毕竟是两码事。如果大家当时彼此能够沟通，将这当作一个学术问题，互相讨论，批评帮助，隔膜是完全可以逐渐消除的。辜鸿铭在北大讲学，错话怪话更多，开明的蔡元培校长仍然让他讲，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现在学生一听逆耳之言，便掀起学潮，要把校长赶下台，这种激进的做法怎么

能够让林文庆服气，又怎么能够得到陈嘉庚的支持呢？

有意思的是，几年之后，林文庆到上海大夏大学参观访问，仍然受到师生的欢迎，欧元怀校长也热情接待，彼此间的嫌隙自此消解。陈嘉庚对欧元怀在学潮中的表现，原来极端不满，后来经过与欧的接触，增进了理解，又知道他有能力，不满之情涣然冰释。事实证明，理解比冲突好，许多隔膜是可以通过对话而得到解决的。

经过这次学潮，林文庆也进行了反思。学潮中，学生对学校的弊病要求改造，后来竟能另立一个大学，这精神气魄不能不令林文庆感动。他认识到，学潮中学生的正当要求自己未能满足，自己一生气，有些言论也确有毛病，辞退四人，引起争执，甚至发生工人咬伤学生之事，自己不能说没有责任，为此他也颇有悔意。自己管理学校，竟出现教授去赌博的事，也暴露了学校在德育和管理上的问题。在学潮中，陈嘉庚虽然支持他，但他并不因此而推卸责任，疏于改进。学潮一过去，他便开始整顿学风，力求跟上时代。他不再设立教务主任一职，以免为该职引起纷争。陈延庭负责校舍建筑，学潮中他把建筑工人拉去和学生相斗，加剧了矛盾。他将陈延庭降职，另调土木系教授田某担任建筑部主任。他注意开放言路，发扬民主，鼓励师生对学校有何不满之处，有何改良办法，“务请各抒所见，报告于该管主任，以资采纳，而利进行”，“不胜盼望之至”。他勉励大家毕业后，“各抱至伟至大的毅力，至勇至诚之愿望，各本所学，各尽所能，为国家增光，为人民造福，万勿辜负本校造就人才之至旨也。”于此可见他是知错能改、办事认真的人。经过他的努力，至1925年秋，厦大校务又重新走上正轨。但经过学潮的内伤，入学的学生数有所减少。为了研究解决学校的发

展问题，他于1925年底，赴新加坡面见陈嘉庚，商讨校务。

林文庆到新加坡后，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报告厦门大学的创办经过及近况，受到新加坡人士的热烈欢迎。海峡泰晤士报于1926年1月22日发表专稿“厦门之模范”一文，其中说：“博士在厦之建树，若在此间，更为易易……陈嘉庚先生，尤堪敬仰……至其维持厦门大学之精神，尤令人叹赏不置。……夫以先生一人之力，而能为厦民广造学问之福，我新加坡人对之能无兴起？”

陈嘉庚的实业，在1925年底正处于鼎盛时期，仅这一年内就获利800万元，陈、林二人讨论后，一致决定厦门大学要继续发展。林文庆回到厦大时，全校师生到码头迎接，沿途燃放爆竹，形同过节。他在大礼堂报告在南洋之经过及校主决心竭力维持厦大的发展计划，全校师生为此欢欣鼓舞。

厦大环境虽好，但僻处东南，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当时交通又十分不便，著名学者教授一般都不愿来。林文庆为了罗致人才，采取重金礼聘的办法，当时国内大学教授月薪最高的是200元（银元），林文庆却决定厦大教授月薪400元，讲师200元，助教150元，绝不拖欠。这样优厚的待遇果然引来了许多凤凰。林语堂、沈兼士、鲁迅、张星娘、顾颉刚、秉志、姜立夫等二十多名著名的学者专家相继应聘而来，师资大为充实。教授均亲自授课，许多课程都受到学生的欢迎。科研方面不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理科生物学的研究工作成绩尤为突出。

林文庆对国学，提倡不遗余力。1925年冬，他开始筹划成立国学研究院并向北大的沈兼士等发出聘书。沈兼士提出规模很大的研究计划，得到林文庆的同意。林文庆兼任院长，沈

兼士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兼任研究院总秘书。实际工作由沈负责。

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准备大展宏图研究国学时，一场震撼全国的学潮又掀起来了。

当时厦大的理科主任是著名化学家刘树杞，刘又是学校的秘书，地位仅次于林文庆，有一段时间还代理过校长之职。刘树杞对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原先并不赞同，只因林文庆坚持要办，刘才勉强同意。林文庆为了团结刘树杞，提出拟任命刘为国学院顾问，但被国学院拒绝，鲁迅曾表示“国学院无请化学家作顾问之必要”，双方开始产生矛盾。其后又因住房、经费等问题，理科和国学院矛盾越来越大。在国学院内部，也存在派系矛盾。鲁迅认为顾颉刚是胡适的门徒，其他一些人是陈源之流，和他们合不来。沈兼士感到理想难以实现，托辞先离开厦大，孙伏园也因出版周刊问题与校方意见不合，辞职到广州去。1927年1月4日，鲁迅决定应中山大学之聘，离开厦大到中山大学去任教。他向厦大提出辞职，并声明自1926年12月31日与厦大脱离关系。鲁迅被公认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文系的学生非常崇拜他。鲁迅认为林文庆是尊孔的，对林不满意。林文庆设宴欢迎太虚法师和马寅初时，请鲁迅作陪，鲁迅都拒绝了。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说：“鲁迅不了解厦大，厦大也不了解鲁迅”，确是如此。鲁迅对厦大的住房、膳食、办文物展览以及著作的出版等意见不少，使他感到压抑，这在《两地书》中有详细的记载。鲁迅想走，林文庆虽一再挽留，终也留不住。就在校园内充满与鲁迅惜别之气氛时，学生贴出“刘树杞不去，厦大无望”的大标语，掀起“驱刘”的学潮。学生要林文庆斥退刘树杞，并在12小时内答复，否则即宣告罢课。学生会的决议中

还出现“刘树杞破坏学校，是反革命”、“通缉刘树杞”等口号，矛盾十分尖锐。但理科一些教授却支持刘树杞，愿与刘同进退。理科的一部分学生也拥护刘树杞，情况变得错综复杂。厦门著名绅士黄廷元、孙印川等虽出面调停，终难解决。当时在厦门的蔡元培因情况复杂，也不愿参与调停。刘树杞自动辞职，林文庆尽力挽留，也无效果。1月13日，林文庆设宴为鲁迅与刘树杞二人饯行。鲁迅去中山大学，刘树杞则去武汉筹办武汉大学，后来到北大任理学院院长。

在这次学潮中，林文庆因与刘树杞关系密切，有些激进的学生迁怒于林文庆，提出驱逐林文庆的口号，但许多学生表示反对。林文庆处于困难时，于1月23日南渡新加坡，找陈嘉庚商量对策。陈嘉庚态度明朗，坚决支持林文庆，他打电报给厦大代理秘书黄开宗，通知：国学研究院，自本年起停办；除张星烺、顾颉刚二位教授留用外，其余即行辞退。并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朱斐等19人（其中11人是国民党员）。还回电说：“更换校长，权操在我，学生无理取闹，如不复课，即日停膳、停火，驱逐出校。”林文庆有了校主的全力支持，终于又渡过了一次风浪。当时厦门流行一句话：“一木支大厦，双木支厦大”。双木即指林文庆。

但这次学潮对林文庆一生的声誉是很有影响的，直至今天，情况依然没有改变。由于林文庆得罪了鲁迅，鲁迅说林文庆是尊孔的，而鲁迅是旗手，林文庆便倒霉了。我问过许多厦大的校友：既然林文庆为厦大作出很大贡献，为什么厦大对他如此冷淡？回答是：林文庆得罪了鲁迅嘛。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实在是林文庆的不幸。第二次学潮中，文科学生主要是反对理科的刘树杞，林文庆不过被牵连到，林语堂与林文庆的

矛盾更为表面化。但因这次学潮中，鲁迅提前辞职，学生怪罪于林文庆，林文庆便成了罪人了。其实，我们应当冷静地想一想，林文庆是爱才的，对刘树杞的自动辞职，对鲁迅的想离开厦大，他都挽留过。他是真心想办好国学研究院的，不然他为什么要用重金把林语堂、鲁迅等请来厦大？厦大的经费和陈嘉庚的实业息息相关，钱多时就大办，钱少时就缩减，这无可指责。1926年时陈嘉庚的事业遭到预料不到的挫折，资金周转不畅，还叫在日本治病的其弟敬贤节约开支，早点回国。林文庆只好听陈嘉庚的意见，缩减国学院的开支，据说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林文庆表示经费问题要听“有钱人”的意见，鲁迅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铜板，放在桌上，说：“我也有钱，我要讲话”，弄得林文庆十分狼狈，啼笑皆非云云。这故事到处流传。但大家不妨想一想，这“有钱人”是谁？除了陈嘉庚，当时还有谁为厦大出过钱？林文庆不听陈嘉庚的，还听谁的？我们讥笑林文庆，岂不也得罪了陈嘉庚？被鲁迅批评过的人可谓多矣，有的批评远比批评林文庆尖锐，但不见得被批评过的都是坏人。如鲁迅批评周扬等“四条汉子”，不过是“四个男人”的意思，并非在政治上下结论。鲁迅当然是伟人，但对任何伟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有什么理由认为林文庆因和鲁迅有过一点冲突，被鲁迅轻蔑过，就应该一辈子遭受冷遇？著名报人徐铸成在《报人六十年》中感慨地说：“正是在《两地书》里，曾对文庆先生用过轻蔑的语调，遂被后来的‘凡是派’所贬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古今人物，只要确实热爱祖国，对中华民族有重大贡献的，都应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必对古人如此苛求呢？……历史已证明，陈嘉庚、马寅初、顾颉刚诸先生都是我们民

族的精英，将与鲁迅先生并垂千古，两位林先生（指林文庆与林语堂）也是我国民族的骄傲，也将永远光耀在史册上。”我想，这段话大家应当都会同意的吧！

尽管林文庆先生在主持厦大时遇上两次学潮，心情不甚愉快，但他对厦大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1921年厦大刚刚创办，他便设立了林文庆基金，把自己在新加坡兀兰所拥有的一块51英亩土地，分赠给厦大、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及家属，厦大占三分之二。在厦大当校长的前几年，他不领薪水，完全是义务效劳。直至他个人产业破损，经济不景气时，才接受厦大发给的薪金。他在鼓浪屿家中为富贵人诊病，所得诊金悉数捐给厦大。厦大经费陷于困境时，他奔走于南京、上海、福州、广州等地，四方筹款，备极辛劳。有一次他还把一年的薪金六千元，全部献给厦大。他夫人殷碧霞也捐献一千元。他还三次到新、马募捐，最后一次到新、马时，他已66岁，每天仍早出晚归，不顾疲劳，募捐中，有时还低声下气地对人说：“我求你，请你帮厦大，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作为厦大的一个校友，看了海外著作中对林文庆事迹的介绍和评价后，我不能不深深地为林文庆先生公而忘私、热心办学的精神所感动。他对厦大的贡献，我们后辈应当记在心中，不该这么快就淡忘。

厦大的经费全靠陈嘉庚先生一手维持，以后又得到许多华侨的赞助。但到1937年，陈嘉庚先生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只好将厦大交给政府。7月1日，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立。7月29日，林文庆移交完毕后，返回新加坡。萨本栋继任校长。

林文庆来到厦大后，他在新加坡的财路已断，社会地位也被别人逐步取代，他把财产委托他人掌管，因委托非人，蒙受了巨大损失。他回新加坡时，几乎是一无所有，连寓所也是友